绿色发展

汽车行业绿色发展 助力实现碳中和碳达峰

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世界正迎来一场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革命与变革。我国一贯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把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 朝 创

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致使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暖，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事件变得更加频繁，气候变化已经是眼前的威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排放大国，我国已经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将陆续发布顶层设计的指导意见。

“双碳”目标提出以后，正在成为影响汽车产业链变革重构的又一重要因素，汽车行业的节能减排已是大势所趋，但目前我们多数还都集中在使用环节，通过能源转型，如像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减少车辆的尾气排放。同时，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环节的脱碳也至关重要。

产业发展空间大 努力绿色转型

近日，在天津滨海新区召开的“2021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企业界代表就汽车业实现绿色发展进行探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指出，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排放大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仍超过50%，单位GDP能耗约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完成全球最高强度碳排放降幅。而交通是重要的碳排放部门，当前，我国交通领域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10%左右。

为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近年来汽车行业坚持油、路、车统筹，新老机动车并重，加快构建现代化环境管理体系，取得了积极进展。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吴险峰表示：“我国对环保需求大幅度提升，我们以清洁运输要求和行业管理为重点，积极推动钢铁、电力等行业的运输清洁化，不少涉及大宗货物运输企业积极采购国6新车和新能源汽车，推动各地在公交、轻型物流、港口民航领域，积极推广新能源汽车，全国新能源公交车占比从2015年20%，提升到现在60%以上。汽车的生产制造过程环保水平也明显提升，近年来，汽车产业在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轿车基本实现水性化、自动化、智能化喷涂，喷涂工艺实现密闭化。”

汽车流通连接着生产和消费，并且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对促进形成绿色低碳的出行和运输方式有重要作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二级调研员宋英杰表示：“汽车领域实现‘双碳’目标，我们首先要促进供需匹配，二是要提高汽车流通效率，三是能用尽用，物尽其用。”

随着个人家庭使用交通工具需求增长，发展公共交通、智能交通、电动汽车、氢燃料汽车等零碳汽车是交通领域技术竞争的高地之一，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核心举措。解振华指出，2020年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超过600万辆，呈高速增长趋势，今年上半年增加110多万辆，与此同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国，技术方面已经形成领先优势，发展高质量新能源汽车是构建低碳交通运输体系的关键环节，和建设低碳城市的重要组成。

在新能源汽车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双碳”目标下的国家政策方针等也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技术成为汽车行业革命的技术基础。新技术突飞猛进，相互促进，推动汽车产业变革。数字化转型和区块链技术革命推动了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从消费升级到个性化产品到AI自动驾驶，同时推动了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零售和服务业态的变化，正在向移动用车生活的价值提升模式等的变化。”浙江零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总裁吴保军说道。

产业链协同创新 促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发展方面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成果显著。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司副司长续超前就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讲到，首先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发展，已成为战略必争领域，汽车与其他高技术领域融合，新一代汽车技术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新能源汽车与新能源技术的融合更加紧密，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重新定义了汽车产品属性。

岚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CEO卢放表示：“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已经成为中国汽车发展的趋势。伴随5G技术的发展、国家的‘双碳’战略目标，会进一步加速中国汽车向智能化、电动化转变。目前东风内部已经在对增程器技术路线、包括燃料电池技术路线，进行思考和研究。如果中国自主品牌想在未来汽车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那么我们全产业链必须实现自主可控。只有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才能够在国家战略响应方面、行业趋势演变方面、用户需求方面取得一定的先机。对于东风和岚图而言，只有自主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才能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我们还要把关键的核心技术通过岚图品牌实现产业化、商品化，能够把东风的一些先进技术在岚图的产品上落地，提供给用户。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将传统汽车的技术集合新能源、智能网联、云等新技术，创造出真正智能化、网联化、新能源化的产品，给用户带来更好的用车的体验。”

随着科技进步，数字化、智能化越来越多被人提及，汽车产品开发和零部件供应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据苏州安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创始人郭健介绍：“安智汽车在六年研发以来，已经完成了第一代77毫米波雷达和多控摄像头雷达，具备全站成熟L2驾驶员辅助系统。从技术路线上讲，我们在2021年之前的工作叫眼脑合一。2021年之后变成‘睛神分裂’，我们的硬件传感器更逼真模拟人的眼睛感知，从产品策略上往上走只是预控制器，我们的脑子要随着整车厂走，随着行业走。为了学习如何搭建一个更好的脑子，我们模拟驾驶员眼睛观察路况，贴近行业做整车测试。”

创新供应链协同共谋发展，致力于封闭场景L4的自动驾驶汽车开发的浙江翊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文龙从“自动驾驶的场景化仿生设计”角度表示，自动驾驶另一种是车联网，V2X万物联网，蜂群感知。我们最终是希望，个体方面是基于激光雷达的自动驾驶，希望通过激光雷达能够把地图、导航、感知、RGB识别、视觉补盲，全部由一颗RGB-IR-D雷达实现，实现轻量化的自动驾驶，最终实现无人车的商业化产业化落地。

资 讯

江苏宿迁信息化引领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截至目前，江苏宿迁市共发现处置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均为输入性病例，未发生一例本地二代病例，实现疫情“零传播”“零扩散”。自今年7月江苏及国内部分地区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宿迁市通过大数据汇聚各中高风险地区关联数据21.3万条，数据核查率达到98.3%，排查出中高风险地区在宿重点人群11.2万人（次）。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信息化+”发挥重要作用。

运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防控机制，实现数据信息跨领域、跨部门共享互联。将公安、交通、卫健等各类疫情数据进行整合迅速传到抗疫一线。

通过全市社区网格、网格中的755名小区党支部书记、近4000名支委委员化身信息核查“筛子手”，先后排查出相关中高风险旅居史人员96,910人，为疫情防控赢得时间、争取主动。

该市在全省率先上线核酸检测系统，实现核酸检测登记、采集、送检、检测等全流程信息化管理，提高核酸采样检测速度与质量。

发挥远程医疗作用，提高基层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应对处置疫情能力，减少人员跨区域传播风险。

发挥全市基层医疗卫生等信息系统的“哨点”监测预警功能，对信息系统服务进行升级改造。

该市泗阳县还建立“我的泗阳疫情防控平台”，通过实施“监测—预警—处置”，构建形成监管预警闭环。开发上线全市疫情防控物资直报信息系统，提高数据上报时限和效率，减轻基层在疫情防控中的工作负担。

（宿迁市卫健委供稿）

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爱心敬老小巴士 助力新冠疫苗接种

本报讯 近日，安徽合肥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卓然社区为60周岁以上老人开辟绿色通道，不仅可以上门帮助老年人预约接种疫苗，还安排爱心敬老小巴士提供全程接送服务，切实做好老年人疫苗接种保障工作。

据悉，60周岁以上老人有意愿接种新冠疫苗可直接联系网格员、社区志愿者或者社区工作人员，首先由社区网格长带队，协同网格员先入户了解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接种新冠疫苗前，医护人员会详细询问是否患有不能接种疫苗的慢性疾病，并为老年人测量血压，接种后嘱咐接种疫苗禁忌行为，30分钟静坐观察，如无不适方可离开。

刚接种完新冠疫苗的王奶奶说道：“我们老人家也想打疫苗，但是因为腿脚不方便，一直都没有去成，这次社区志愿者不仅来家里帮我们预约好，还开车接送，真的很方便，现在终于打完疫苗了，心里踏实多了！”

（郑怀中 沈万金）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浅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时期在河南的实践

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在太行山上建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图为参观者在红旗渠纪念馆参观。（资料图片）

贾天勇 摄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基本总结。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历了曲折才形成、发展并逐步完善的。学者对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有不同的分期，不过，把党成立后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间作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时期已经形成共识。在大革命时期，党在河南领导农民运动时，采取统战的策略，对成分复杂的红枪会进行引导和改造，并发动了豫东农民武装起义，有力地策应了北伐。

党对农民问题认识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了“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在“一大”决议里面更多地关注“工人组织、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等。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扎根于工人阶级。到党的二大时，我们党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有了明确的认识，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共“二大”宣言中就提到：“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贫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于1923年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关于“农民问题”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邓中夏也提出：“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不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积极参加，哪有希望”。之后，党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且集中于长江以南地区。在中共党内最早开始农民运动的是澎湃领导的广东海丰县地区的农民运动，并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也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最好的地区。

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初具雏形

河南的农民运动有其特殊性，河南农民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为了自保，彼时多已加入红枪会等各种会门组织，如通许县娄伯寻创建的通许红枪会，从1923年创立到1924年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发展到通许、杞县、陈留三县，人数达到30多万。由于红枪会自身的局限性，具有宗教迷信色彩浓厚、思想愚昧、武器落后、派别林立、组织松散、立场不坚定等特点，且成分复杂，不仅有农民，还有游民、土匪、地主、乡绅等等，有的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有的是土匪组织，有的则为地主豪强所利用。基于这样的现实，党在河南开展农民运动的策略要和之前中国南部省份有所区别，如果处理不好，还有可能把枪会里的农民推到敌对的阵营。如何把红枪会的力量变成革命力量，这是摆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面前而且必须作出回答的时代命题。毛泽东很早就对中国农民问题予以关注。早在1919年7月28日，他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农民“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讲到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他指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李大钊更进一步指出，党要派人加入红枪会内部，从而“变旧时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李大钊以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洞察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给我们指出了要和枪会民众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肖桂林曾对李大钊“乡村联合战线”思想进行了论述。肖桂林认为，“乡村联合战线”的阶级基础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可分为劣绅、乡绅、土豪和绅士，应该加以区别对待；革命者要教育、引导农民；应以贫农、佃农和雇工为主力成立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阶级性与红枪会等农民组织有本质上的区别。”[肖桂林：浅析李大钊“乡村联合战线”思想的基本内涵（J），党史文苑，2011-02]不难看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等对中国农民运动的论述以及李大钊“乡村联合战线”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雏形，并在实践上指导着河南的农民运动。

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农民运动中的运用

五卅运动后，中共中央和李大钊先后派了大批优秀干部赴河南开展农民运动，其中有王若飞、肖人鹄、王克新、张海峰等。1925年10月，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后，11月，“王若飞、肖人鹄等将豫南信阳、豫西荥阳、豫东杞县作为全省农民运动的重点，开始普遍建立农民协会组织。”[李永芳：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农民协会数论（J），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农运同志“在广泛组织农民协会期间，开始做红枪会的工作，使不少枪会首领愿意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建立合作关系”。[陈传海，徐有礼：河南现代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肖人鹄以广州国民政府河南特派员的身份到杞县领导豫东农民运动。肖人鹄和杞县特支书记张海峰、共产党员吴芝圃以付集、何寨两个基层党支部为核心，以红枪会为基础开展工作。杞县红枪会最先成立时是中、小地主的看家护院组织，后来才允许底层农民加入，形成了玄门红枪会、坎门红枪会和离门红枪会交叉并存局面。其中，坎门红枪会公推通许县东北部娄拐村的娄佰循为总团长，运店村曹金林为副总团长，白塔村刘锡禄为总团军师。玄门红枪会公推何心榕为总团长。党特别注意对红枪会中、下层人员的秘密联系，争取与团结，对上层首领做统战工作，积极发展革命力量。随着党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红枪会组织的领导阶层发生了急剧变化，部分开明进步首领顺应了形势要求，日益倾向革命。1926年2月1日，在杞县甲种农业学校礼堂举行了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广州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和广东省农运负责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都亲笔写信向大会表示祝贺。杞县农协的成立，极大推动了全省的农民运动。不久，红枪会首领何心榕、孔泽友、安子敏、孔寅初、韩云亭、何心彬、张玉镜、李福瑞、吴体彦、王国安等先后加入共产党。

河南农民运动促进广大农民思想觉醒

李大钊在1925年12月30日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指出：“最近河南的农民运动亦颇著成效。”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初，河南农民运动发展规模和人数均仅次于广东而居全国第二位。[鲁玲：李大钊与河南的革命运动（J），兰台世界，2012年5月]1926年4月，在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下，河南省农民协会在开封成立，肖人鹄、张海峰被选为主席、副主席。“河南省农民协会是在全国继广东省农民协会之后成立的第二个省级农民协会，进一步促进了全省农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李永芳：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农民协会数论（J），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农民群众觉悟有了很快的提升，他们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越来越的农民和红枪会群众纷纷加入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越来越多的枪会首领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所以说大革命时期“河南的农民运动，十之九是枪会运动”。[河南农运报告（A），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据1926年4月报刊记载，仅信阳、许昌、杞县等6个县加入农民协会的红枪会员即达10万人。到1927年3月，河南红枪会支配下的群众已“不下百余万了”。尤其是以杞县为中心的相邻几个县，由红枪会改造成的农民自卫团纷纷加强军事训练，开展联合行动，共同对付反动军阀和土匪，为豫东农民武装起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时期的光辉实践

1927年3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河南省五大地区（豫东、豫南、豫北、豫西、豫中）农民代表会议，会议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他对如何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北上作了明确指示。之后，肖人鹄、张海峰、吴芝圃、孔寅初、王亦言等人成立了中共豫东农民自卫军领导组临时支部，筹备起义事宜。为了联合豫东各县统一行动，张海峰于4月赴通许、陈留、睢县、宁陵、商丘、永城等地开展联络活动。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推进，豫东各县县城已没有奉军主力，革命形势已经高涨起来的豫东正是起义的好时机。5月23日，肖人鹄、吴芝圃、韩绍棠等人在杞县南部何寨何家祠堂宣布举行豫东农民武装起义。“农民自卫军占领杞县县城后，建立了杞县有史以来第一个民主政权——治安委员会。豫东农民武装起义一举占领5座县城，第一次在县城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政权，成为民主革命时期豫东农民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开封历史（第一卷）（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虽然起义最后失败了，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否认，豫东农民起义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时期指导河南农民运动的一次光辉实践，在战术方面无疑是成功的。

（安北平：中共开封市委党校教师；王柳：河南省化工技师学院教师）